1、什么是军事谋略？

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黄石公三略》

何谓军事谋略？对此，人们反视着战争舞台上发生的那些精彩动人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回答。鉴于此，我们就首先从什么是军事谋略谈起，对军事谋略的含义作一个准确合理的诠释。

先来看一下一般意义上谋略的含义。“谋”与“略”的原义是什么呢？中国训诂史上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说，“谋，虑难曰谋，从言某声”；“略，经略土地也，从田各声”。可见，“谋”的本义是“虑难”，就是思虑解决繁难矛盾的方法；“略”的本义是“经略土地”，划定疆界。而现在所谓的“谋”与“略”，自然已经从其本义衍生出来更多的意义，如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中，对二字分别列有十余个义项，其中都有一项十分相近的含义，就是“计谋、策略”。“谋略”一词就是由上述两个语素或词根的同义项联合构成的复合式的合成词。《辞海》、《现代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对“谋略”的释义都是“计谋策略”。这一解释是用了两个近义词“计谋”和“策略”来准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简明地作了解释。其实，与“谋略”一词概念相近的词语有很多，如，单音节词有：谟、谋、略、计、智、权、策、韬、谞等，双音节词有：权谋、智谋、计策、机谋、智术、猷略、权策、谋虑、策谋、机略、权策、权诈、略术、韬略、智策等，多音节词有：计谋策略、智略权谋、才策谋略、长算远略、奇谋妙计、雄才伟略、文韬武略等。

考证军事谋略的含义，从历史文字记载上作些探寻是必要的。就普遍意义上讲，尽管人类军事谋略的实践早于文字的出现，但对词义的考证，我们可从中看到人们对军事谋略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上古典章文献汇编的古书——《尚书》中记载了谋略概念和谋略词语的产生。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的大臣益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使用“谋”这个词来表达“谋略”概念的人，书中还记载了舜也使用了“谋”这个词；《尚书·禹贡》中“略”这一词也出现了，几乎与“谋”一词同时代出现。《大禹谟》所记叙的是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逐步走向奴隶社会的变革时代，当时私有制已经萌芽，人类战争开始出现，人们在头脑中形成军事谋略的概念是可能的。如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已是全国规模的大战。面对蚩尤强敌的进攻，黄帝已懂得利用天时、地利、人和，采用诱敌深入谋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后，大败蚩尤。春秋时期的《管子》一书中，多次使用了“谋”这一概念，并把“智”与“谋”两个语素连起

来使用。到春秋末期，《孙子兵法》问世，明确地提出了“上兵伐谋”的思想，开始将“谋”一词限定于专指军事谋略。秦末汉初的兵书《六韬》中，第一次把“智”、“略”、“权”、“谋”四个语素连结起来表达谋略的含义。西汉刘安《淮南子·兵略训》中所谓的“兵略”即军事谋略。三国时期，魏散骑常侍何曾向魏明帝的上疏中，历史上第一次把“谋略”二字相连使用来表达军事谋略。《三国志》中评程昱、郭嘉等人“才策谋略，世之奇士”，《陆逊传评》日：“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这是为称赞军事人才之创用名词。可见，从谋略概念最早出现于记载，历时两千余年才第一次用准确简明的“谋略”一词来表达。

尽管谋略的产生并不只是局限于军事领域，但是战争的对抗性、激烈性、残酷性决定着它是谋略生成的重要的发源地。因此，人们常说的谋略，往往就是指代军事谋略而言的。近年来，随着新军事变革步伐的加快，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为军事谋略的运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人们对军事谋略的日益关注，对其含义的认识更为深刻。我们认为，所谓军事谋略，即军事斗争中的计谋和韬略，就是指在战争准备和作战实施过程中，对抗双方在既定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适时采取恰当的作战手段和军事计策。可以说，军事谋略是战争发展的产物，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于物质力量的具体体现，是活力对抗中撞击出来的火花。在活力对抗中形成策略、方略，是

军事谋略区别于其它种类谋略的重要特征。通俗地理解，军事谋略就是指挥员在掌握丰富知识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通过思维所产生的制敌妙策。就其性质而言，它高于一般的战术原则，反映了军事斗争一般规律，因此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长的生命力。这就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谋略论著至今仍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原因之所在。

革命导师列宁明确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表明，“兵以诈立，多谋者胜”，因此，“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将帅之道，谋字第一”等格言，也就成了许多明智的军事家的信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成了军事斗争制胜的妙诀，也是军事谋略的核心和要旨。以往战争史中流传下来的许多奇谋方略（如三十六计等），以及古代军事谋略家总结提出的许多谋略原则（如孙子提出的“十三诡道”、奇正相变、攻其必救、以迂为直等），时至今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尽管在军事对抗中，无论哪一方，为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在施展军事谋略时，需要人为地制造出许多假象来，但军事谋略并不只是军事斗争中的欺骗术，而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

善于施计用谋的指挥员，就能够在异常复杂的战争舞台上屡建奇功，即便处于进退维谷之际，仍能发挥创造性思维，想到超乎常人的奇计和妙策，力挽狂澜，扭转战局，这就是军事谋略的作用。深谋远虑的本领来自于广博的知识，而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有价值。“识

多才能智广”;“足智始能多谋”;“善谋方能制胜”,就是这个道理。

2、军事谋略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

谋略的出现，有着久远的渊源。但到底源于何时？长期以来，对这一命题有着各种各样的推论和设想。有人说，谋略源于劳动，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而产生智慧，劳动是生成智慧的温床；有人说，谋略源于战争，人类间的争斗、厮杀，是产生谋略的土壤；也有人说，谋略源于思维，谋略伴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而发展，谋略是思维对抗的成果；还有人说，谋略源于兵学，世所公认的东方兵学鼻祖孙武，可以说是谋略的鼻祖；还有人认为，谋略与动物求生的本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上各家之言，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就军事谋略来讲，随着人类的进化，思维的发展，为智慧奠定了基础，进而智慧开拓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人类运用智慧与大自然作斗争，战争出现后，这些智慧转而用于人，这才拉开了军事谋略运用的序幕。

在战争还没有出现以前，人类在同恶劣的自然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境、飞禽走兽的斗争中，不仅学会了使用自己的体力，而且懂得了运用自己的智慧。在远古时代，人们为了生活，“钻木取火”以获得能源；为了生存，由操纵石头、木棍、利器到挖壕设障，并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创造了一整套猎取食物的方法。如，挖陷阱诱兽落网，挥器呐喊驱兽进入绝境等等。其方法也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据《易·原辞》记载，我们的祖先在围猎布阵中，逐步形成了以十人为战斗编组的打虎战斗队形，区分为主攻队和助攻队。助攻队负责发现、吸引和轰赶野兽，主攻队负责设伏、突击和歼灭。这种谋划猎兽的方法，无疑是军事谋略原始的雏形。

战争出现之初，作战双方通常是兵对兵、将对将的厮杀。这种战争主要是力量的较量，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将士体力的大小和人数的众寡，其结果往往是强胜弱败。在这关系于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弱者要战胜强者，就不得不寻求打败强大对手的其它途径，而不能以硬碰硬。因此，变“以力求胜”为“以谋取胜”的思想开始萌芽。

但是，谋略真正运用于军事领域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国古代历史看，起初，由于受封建周礼的制约，兵家奉行“以仁致胜的正道思想”，提倡“仁义之兵”，“成列而鼓”，于是就出现了毛泽东所讽刺过的“宋襄公蠢猪式的迂腐”。在这种“正道”思想指导下，自然谈不上运用谋略了。由于人们还不能清楚地认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军事谋略思想在较长的时间里

被禁锢于“仁义用兵”的硬壳之中。然而，战争的实践无情地嘲笑了这种无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提出了以“诡道”取代“正道”的“权诈之兵”思想，在他的军事巨著《孙子兵法》中，着重强调了战术上要灵活多变、“示形”用谋、欺敌用诈等谋略思想。从此，谋攻这一作战原则终于脱壳而出，谋略运用已经从“不自觉”走上了“自觉”，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从而使谋略真正登上了军事斗争的历史舞台，并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战争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

战争实践使军事谋略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理论上的研究、探索与总结又推动着谋略水平的发展。自“谋攻”原则确立以后，在长达千年的古代战场上，以谋取胜，便成了军事家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便从理论上不断探索用兵法则、筹划布阵的奥妙，使兵法原则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从手段上不断创新，学会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方面的条件，总结出了一整套“示形”、用佯、诱敌就范的基本方法，使谋略手段更加多样化和行之有效；在思维方式上，掌握从相辅中求相成，又学会了从相反中求相成的途径，从而使军事谋略在理论和实践上日趋完善。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今中外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谋略家，他们的谋略思想渗透和闪耀着军事辩证法的光辉。从大量的谋略运用的实例来看，人们的谋略和战法运用已经贴近、符合军事辩证法的要求，遵循了军事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只有谙熟军事辩证法的原理，懂得攻防、阴

阳、刚柔、奇正、虚实、强弱、得失、进退、迂直、胜败等变化之理，才能掌握如何判断决策、如何避实击虚、如何通权达变、如何捕捉战机把握枢纽出奇制胜的艺术。

到了近代，火器取代了冷兵器，军队的机动能力日益提高，战略战术有了新的发展，使得战场形势更加纷纭繁杂。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机动能力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军队的作战能力剧增。在近代和现代的战争中，在世界的许多战场上又上演了一幕幕施展谋略、克敌制胜的生动活剧，丰富和发展了军事谋略的手段和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我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军事谋略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先进思想，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谋略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极大发展和丰富了军事谋略理论宝库。

随着现代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军事对抗的手段不断发展变化，对抗的激烈程度、复杂程度日益增强，既为“示形”、用诈拓宽了许多新的途径，又对军事谋略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人类历史已跨入二十一世纪，人类战争的形态正在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跃变，信息化战争的显著特点是更加突出了“智战”，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需要谋略思考。当人们开始把目光聚集于军事谋略上时，忽然发现中国古老的兵家权谋重放异彩。这当然不是历史长河的倒流，而是跃过一个新

的“螺旋”后的必然表现。虽然军事谋略的一些基本思想原则有着较长的生命力，如隐真示假、示形佯动、制造错觉、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等活动和瞒天过海、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调虎离山等计谋思想，在今天乃至未来都仍然适用，然而，随着技术条件的变化和斗争手段的改变，那些不变的思想原则，也将在变动的环境中改变其内容和形式。

谋略的花朵开放在活力对抗的激流中，我们应勇敢地跳进时代的激流，在那里才是增长聪明才智的最好课堂。新军事变革不是否定军事谋略，而是为施计用谋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相信军事谋略这朵奇葩，必将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3、为何“数”与“形”是军事谋略的基本要素？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孙子兵法》

当我们沉浸于浩瀚的战争史之中，在为军事谋略家们创造的奇迹而惊叹之时，一定还会为那些奇谋方略的产生犯思索。其实，构成军事谋略的原料并不神秘，也

很简单，那就是“数”与“形”。孙子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同样的道理，军事谋略家们就是利用了这简单的两味原料，创造出了无数令人赞叹的奇谋妙计来。这也正是军事谋略的魅力之所在。

那么，什么叫“数”与“形”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表现在军事上，“数”是标志力量及各军事要素大小、性质、变化、变换节奏关系的计量和计数；“形”则是力量及各军事要素的配置编组、设置形式、所处位置、布势构图等方面的表现和外露。在现代战场上，声、光、电、磁、热，这类军事信息的新载体，同样可以用“数”与“形”来概括。“数”与“形”紧密相连，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孙膑在所著的兵书中，都曾用大量篇章讲到“数”与“形”，《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有 30 多处谈到“数”与“形”，而且专门写了“计篇”和“形篇”，强调用数量分析来预见结局，以求先胜之策；用示形来诈骗敌人，隐蔽自己的行动企图。《三十六计》中讲：“数中有术，术中有数”。可见，谋略的产生过程，要进行定量分析、科学运筹，否则，胸中无数就谈不上什么计谋。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也是要以心中有“数”为前提的。

武器装备的发展，不断改变着军队编制体制、战斗队形的成分，促使战斗队形、配置方法发生变化，从而

形成新的作战规模和编成，作战任务的正面宽度、纵深程度、兵力兵器密度、作战速度，以及持续时间等一套表现为“数”与“形”的格式。军事谋略就是通过对这些格式的排列和运用，对战斗单元进行合理编排组合，采用恰当的配置形式，对各种力量进行正确部署和平衡协调，以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也就是说，“数”与“形”是客观存在着的东西，谋略是建立在这些客观实际之上的，并不是单纯思维活动的结果；但离开了正确的思维与科学的决策，“数”与“形”只是干巴巴的形式了，也构不成什么谋略。那么，谋略家是怎样用“数”与“形”这些简单的砖块建造出奇异的“迷宫”的呢？

首先，象征力量的“数”与“形”，同所处的空间位置相结合，就构成了一定的“势”。换句话说，“势”等于“形”与“数”乘以位能，即：势＝（形＋数）×位能。力量元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所表现出的“形”就不同，所发挥出来的整体效益则有很大差异。同样的力量处在不同的位置，可使力量发生巨大的增值或减值。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力量发挥了惊人的增值效益。同一支军队，处于行军、宿营中或配置在阵地上，其战斗力就大不相同；处于锐气正盛之时和处于惰归之际，战斗能力大相径庭。同样数量的火炮，全部部署一正面采用直射的效力，与多面部署所形成的直射、斜射、侧射、俯射交叉结合的效力相比，也很不相同。一个小分队去直接抗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敌人的大兵团，即使可依托非常有利的阵地条件，也只能起到迟滞敌人于有限时间内的作用，倘若深入到敌人腹地去奇袭、偷袭，混水摸鱼，那则会收到打乱敌人阵脚的功效。

其次，象征力量的“数”与“形”与示假隐真相结合，便构成了虚与实的迷彩。在这迷彩中，又派生出强与弱、劳与逸、众与寡、真与伪等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形式。作为两种活力的对抗，决不应简单地以大小论胜负。在这里，正确的决策，是取胜的根本；而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对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力量情况）的准确判断为前提。为了形成己方的正确判断和决策，造成敌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失误，双方在进行力量抗争的过程中，几乎都要集中自己方面的智力，用于示假隐真和识假辨真。因此，双方智力的高低，常常最直接最鲜明地表现在这个示假与识假，隐真与辨真的比赛之中，而比赛的实质是趋利避害、避实击虚、乖其所之、我专敌分。“数”与“形”通过示假隐真，表现为虚与实；虚与实通过对方识假辨真，转化为观念上的利与害。虚实之用者，谋攻之大法。《孙子·虚实》中说：“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避实击虚同趋利避害相一致，都是施谋展策的基本思想。在这个基本思想指导下，产生出许多具体的军事计谋，如围魏救赵、攻其必救，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静待哗、以治待乱，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佯北勿

从、穷寇勿迫，等等。

第三，在作战过程中，“数”与“形”镶嵌在一定的作战原则、作战目标的框架中，可以排列出变化万千的“奇正”魔方。奇正相生，如循无端之环。而军事家设计的每一幅新的“奇正”协调图，都包含着一次创新的谋划，又都不过是对自己手中的“数”与“形”进行了一次新的排列。奇正相生，奇正相变，只不过是给我们进行新的排列组合提供了一种思维上的启迪。本欲进攻甲地，需示出进攻乙地之形；本欲向敌侧翼迂回，需示正面强攻之形；本欲战，需先示之以和……奇正千百，变化无穷。大凡示出者，称之为有数有形，多为正；藏隐者，称之为无数无形（从对方判断而言），多为奇。奇正并用，明暗相托，方能使敌手感到高深莫测，以利于我主动把握着自己的平衡，去打破敌人的平衡。

总之，运用军事谋略，基础的东西是妙算、示形、造势。其中的妙算，最重要的是识敌虚实，辨敌奇正，破敌之势；示形、造势，无非是就自己方面对敌而言，这自然离不开巧设虚实，活用奇正。可见，“数”与“形”是构成和支撑军事谋略的最为基础的要素。然而，尽管《孙子兵法》提出“数”与“形”两条思维线条并用，奠定了全智全谋的理论基础，但“数”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理论的发展中，一直没有被放置到应有的高度。自孙子之后的军事家，多不重视数学计算和定量分析，于是，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思想在后来的发展

中，便没有沿着“数”与“形”铺设的“双轨道”前进，致使兵法理论因因相袭，“示形用佯”、欺敌行诈反成了军事家施韬展略的主要手段。同西方的军事学术相比较，重诡道而轻计算，是中国军事谋略发展的独自特点和历史缺陷。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和运用军事谋略所应注意的问题。

4、军事谋略的特征是什么？

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

——毛泽东

军事谋略区别于一般谋略的最主要特征是“活力对抗”。所谓的“活力”，主要是指能思维的活人，或主要由这些活人组成的集团；所谓“对抗”，包括敌对双方胶着在一起激烈拚杀的状态，也包括对峙、冷战的状态，以及各种角逐、竞争的状态。基于此，军事谋略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欺诈性。“兵者，诡道也。”军事对抗本身就是充满了欺诈。对于“谋略”一词，台湾曹元中写的《军事谋略论》一书中说：“复照二字之支义：谋为欺骗；略为计划之方策、方案、方法。则予以连贯解释：谋略者，欺敌以方也。”在对抗中，一方总要设法伪装自己

的真实企图，或“示形”，或“用佯”，给对方造成虚幻的错觉，使对方难以料定我的本意。所以，在狭义上讲，军事谋略也可以说是一种欺骗术。没有欺诈，难以创造战机；没有欺诈，如何诱敌就范；没有欺诈，奇正无法相生；没有欺诈，虚实不可呼应。单纯的欺诈虽然不是取胜的保证，但是在不影响行动的情况下，多用欺诈的一方总能争得较多的有利条件。

二是动态性。在活力对抗中，存在着两种意志、对策和两种相对智力、能力相向地作出反应性抗争，因此，运用军事谋略实际上是处于“动态博弈”的过程，就是说，双方都要不断地针对对方的行动、企图来设计、变更自己的行动，即所谓的“行动导致反行动”。我们经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变我变”，就是对这种“行动导致反行动”的思想反映。因此，军事谋略在活力对抗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双方的智力角逐，如同比宝斗法，甲出一招，乙必定想出一破法；这时甲又会换一新法，而乙则因之而变……这样交替下去，直至一方被挤垮，或双方智竭力穷，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为止。

三是目的性。军事谋略的目的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对抗双方每时每刻都在意图争取“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地位。对抗双方或者“谋势”，或者“乘机”，以追求主动。另一方面，对抗双方总是要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对抗双方既要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又要实现或保全自己的利益要求，谋略

运用必须同时考虑到“趋利”与“避害”两个方面。因此，追求“全胜”，胜于无形，成为军事谋略的最高境界和目标。

四是双重性。军事谋略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主要是指：科学与艺术并存，风险与机会并存。虽然军事谋略形成了许多带有共性的、稳定的原则、方法，而且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对抗过程更加精确化、科学化，但活力对抗终究不是一道能够预先精确计算出来的数学题，始终会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不可先传”的东西。这就是军事谋略的艺术性特征。同时，军事斗争领域本身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局中人都为不失误而求稳策，但在变化多端的局势中，双方意志、智慧的撞击，必然会因“判断差”造成许多对抗缝隙线和空白点。这对于一方是厄运，而对另一方则是机会。

五是发展性。谋略不只是辩证思维的产物，物质手段的进步决定了谋略的时代方式。经验性谋略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人的知识水平与认识能力有限的古代社会必须依赖的方法。古人云：“吃一堑，长一智”，因而中国古代谋略一般带有经验直观性谋略的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作战方式的变革，军事谋略逐步由经验直观性向科学程序性发展；军事谋略方式由个体（智多星）向群体（智囊团）发展；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使得谋略方法也产生了新飞跃，等等。因此，虽然军事谋略的一般思想、原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但谋略方式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着的；我们在发扬古人谋略智慧的同时，需要结合时代的特点和要求。

六是开放性。军事谋略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且不说军事谋略的基本原理、原则等，在不同国家、民族的军队中，甚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军事领域内都有着较强的普适性；就是跳出军事领域来看，它与其它领域也有着诸多的相通之处，具有积极的指导借鉴作用。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孙子兵法》视为“舍事而言理”的形成上的逻辑思辨之作，那么，一些人把《孙子兵法》运用于企业管理、商业经营、外交斗争等领域，决不是旁门左道，而应视为知识联网，是新的创造与求索。同样，军事谋略也要善于从其它领域中大胆借鉴和汲取养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种开放性特征，是军事谋略之花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此外，军事谋略还具有层次性、交叉性、随机性、多变性等诸多特征，都是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军事谋略这个“多面体”的刻画，但应着重把握“活力对抗”这个基本特征，没有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的“活力对抗”这一特定的形式和环境，便不会有军事谋略的产生与运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